

顧頡剛的內心恐懼

● 謝 泳

1949年，顧頡剛57歲。他沒有走，留在上海復旦大學當教授。顧頡剛早年出身北大，是沐浴着五四的精神成長起來的，他在《古史辨》一冊的自序中說過：「若是我不到北京大學來，或是子民先生等不為學術界開風氣」，「要是不逢到《新青年》的思想革命的鼓吹，我的胸中積着許多打破傳統學說的見解不敢大膽宣布」。五四精神鼓舞着顧頡剛，影響着他的學術思想和對社會生活的看法。顧頡剛又是受胡適、傅斯年、錢玄同等人的影響成長起來的，在精神上深信特立獨行的原則。1925年女師大學潮引起北大同人內部的矛盾，顧頡剛曾致函胡適，勸他「不必與任何方面合作，要說話就單獨說話，不要說話就盡守沉默」^①，可見當時顧頡剛對學術之外的事情，興趣並不大。顧頡剛小胡適兩歲，但對胡適極其恭敬，凡給胡適寫信，均以學生自稱。顧頡剛對胡適熱衷政治很不理解，勸他：「我希望先生的事業完全在學術方面發展，政治方面就此截斷了罷。」^②顧頡剛和胡適雖然是同齡人，但胡適對顧頡剛卻有導師的作用，顧頡剛曾說過：「自從遇見了先生，獲得了方法，又確定了目標，為學之心更加強烈。」^③顧頡剛和傅斯年也是好友，但兩人個性不合，顧頡剛也曾對胡適說過：「我和孟真，本是好友，但我們倆實在不能在同一機關作事，為的是我們倆的性質太相同了。」^④

我之所以要說明顧頡剛和胡適、傅斯年的關係，是想指出，曾經有很長時期，我們簡單地認為當年胡適、傅斯年留在大陸的好友顧頡剛是和他們二人分道揚鑣的，這既不符合事實，也不近人情。劉起鈺先生在《顧頡剛先生學述》一書中曾有許多文字述及顧頡剛與胡適、傅斯年的不同，但多數不能服人^⑤。50年代顧頡剛在批判胡適的運動中表過態，寫過文章，這是事實，但對顧頡剛當時作為一個年逾六十的老人，在那樣的氣氛下說點違心話，也不是不可以理解的。當年留在大陸的史學家，有三個人和胡適的交情最深，一是吳晗，一是羅爾綱，還有就是顧頡剛。他們三人中，只有吳晗沒有寫過批判胡適的文章。據我個人的理解，吳晗之所以沒有寫，是因為他當時的政治地位已是政府官員，如果他還在大學教書，恐怕也不得不寫。在當時批判胡適的鋪天蓋地政治狂瀾中，甚麼人情、禮法、師友、前輩統統化為烏有，剩下的只是唯一的政治標準。對顧頡剛來說，他內心不僅是痛苦的，而且還充滿恐懼。這恐怕是他同時代許多舊知識份子在當時的心態。

1954年，顧頡剛由上海來到北京，很快和當時歷史所的實際負責人尹達有了矛盾，一直悶悶不樂。雖然他不敢拍案而起，但他的痛苦卻在日記中流露出來。1952年4月2日的日記中有這樣的記載：「久不作文矣，今乃得抽閒作得一篇，大非易事！」^⑥1952年

7月，顧頡剛參加了上海高校的思想改造運動和三反運動。他在日記中寫出對這次運動的感受：「此次學習，可怕者三：天正熱，不堪炎熱，一也。刺激太甚，使予接連不得安眠，二也。開會太多，無寫作自我批判的時間，三也。」^⑦顧頡剛從50年代初期，就處在這樣一種恐懼中。他雖然盡量表態，盡可能按新時代的要求來批判自己，但在內心深處，他還是不認同的。他在一封信中說：「本年三反、五反、思想改造三種運動，剛無不參與，而皆未真有所會悟。所以然者，每一運動皆過於緊張迫促，無從容思考之餘地。剛以前作〈《古史辨》自序〉，是任北大助教六年，慢慢讀、慢慢想而得到的。因為有些內容，所以發生了廿餘年的影響。今馬列主義之精深博大，超過我《古史辨》工作何限，而工作同志要人一下就搞通，以剛之愚，實不知其可。……若不經漸悟之階段而要人頓悟，所謂『放下屠刀立地成佛』，此實欺人之語耳。」^⑧

顧頡剛在50年代的處境，也可以從他和童書業與楊向奎之間的關係看出。

童書業並沒有正規學歷，曾在浙江圖書館做校對員，但童書業喜好讀書研究。1934年，他寫了一篇評顧頡剛《尚書研究講義》的短文，發表在《浙江圖書館館刊》上，並寄了一份給顧頡剛。後顧頡剛回杭州省親時，便去找他。第二年又邀請他到禹貢學會給自己當助手，童書業從此開始了自己的研究工作，並且做出了很大成績。而楊向奎曾是北大歷史系的學生，幫助顧頡剛查閱《道藏》，並續完顧頡剛的《中國上古史講義》，這部分文章，被顧頡剛收入《古史辨》第七冊中。可以說，顧頡剛對楊向奎和童書業均有知遇之恩。然而，1952年童書業在《文史哲》上發表〈古史辨派的階級本質〉，楊向奎發表〈古史辨派的學

術思想批判〉。對此二文，顧頡剛在日記中說：「均給予無情之打擊。」^⑨但顧頡剛對童書業和楊向奎的做法並未責怪。1954年王樹民對童、楊二文表示「竊未敢以之為然」。對此，顧頡剛的看法是：「此是渠等應付思想改造時之自我批判耳。以彼輩與《古史辨》之關係太深，故不得不作過情之打擊。苟我之學術工作已不足存於今之世，胡近來二君又為《文史哲》向我索稿乎？故其為否定之批判，是可以原諒者也。」^⑩既然顧頡剛對胡適的批判是出於恐懼感，他才能理解學生也是出於同樣的恐懼感來批判他的。在《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》中只有兩處提到顧頡剛，對他當年的批胡的事均未提及，可見胡適也未放在心上。

整個50年代，顧頡剛基本沒有甚麼好心情。他在日記中說：「到京八年，歷史所如此不能相容，而現在制度下又無法轉職，苦悶已極。」^⑪到了文革，顧頡剛作為反動學術權威，戴高帽，受批判，每天到歷史所勞動，一直持續到70年代初才得以解脫。和同時代的學者比較起來，顧頡剛的後半生基本還在做學術工作，但他在50年代的恐懼感，卻為我們分析當時知識份子的心態提供了一個極好的例證。

註釋

①②③④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：《胡適來往書信選》，上冊（香港：中華書局，1983），頁344；430；533；535。

⑤ 劉起鈞：《顧頡剛先生學述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6），頁258。

⑥⑦⑧⑨⑩⑪ 顧潮：《顧頡剛年譜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93），頁346；347；347；346；352；372。

謝 泳 現為山西省作家協會研究人員，主要研究中國現當代知識份子問題。